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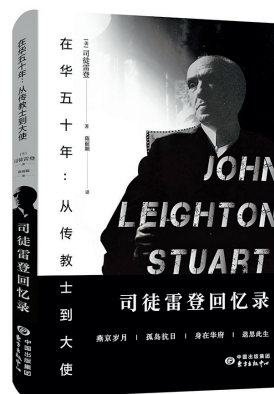
司徒雷登與燕京大學

近年，中國政府努力扎根中國大地辦大學，走出一條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的新路，冀將中國文化與紅色基因傳承下去。對此，作者以首任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的經歷，點出「司徒雷登為維持燕大自由風氣所傾注的心血告訴我們，具有政治或宗教動機的政府資助並非一定導致學術研究的意識形態化。」先例在前，到底我們應在新路上繼續前進，或是走上教會大學中西合璧的辦學理念之路？

——編者

涂航

司徒雷登的回憶錄《在華五十年：從傳教士到大使》。(資料圖片)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九日，新華社刊載了毛澤東親自撰寫的一篇時評，題為《別了，司徒雷登》。時值天地玄黃之際，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國民政府分崩離析，美國國務院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為其對華政策辯護。作為回應，毛澤東連續撰寫五篇密集的政論「排炮」，以評價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等人物來批駁白宮的對華政策論述。文中，毛澤東將美國司徒雷登稱為「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並無不戲謔地指出：「司徒雷登……在中國有着廣泛的社會聯繫，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平素裝着愛美國也愛中國的，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毛澤東行文瀟灑，嬉笑怒罵，充滿了勝利者雷霆萬鈞的氣魄。隨着這篇文章被收入大陸中學語文課本，「司徒雷登」這個名字在中國成為家喻戶曉卻聲名狼藉的反派人物，與數年之後消亡的燕京大學一同匯入歷史的洪流，成為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代名詞。與此同時，遠在美國的司徒雷登本人，也是晚景淒涼，在物質窘困和精神失意的雙重桎梏下度過了最後十三年春秋。

赴京創辦燕京大學 培育知識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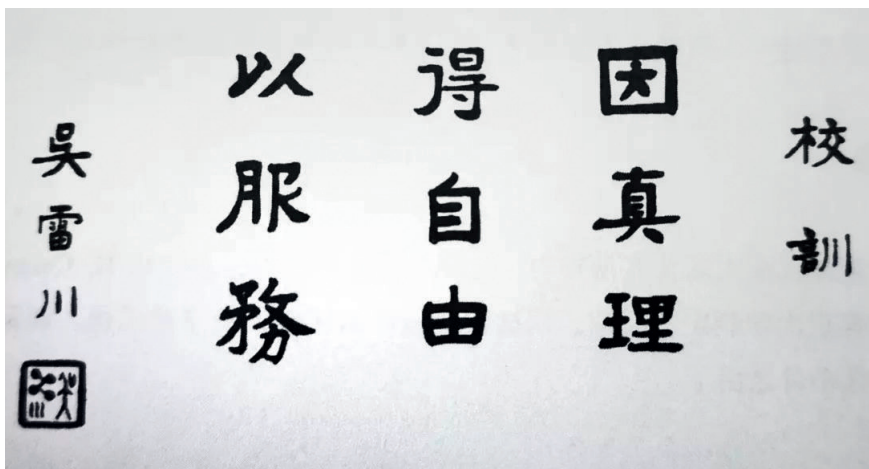
司徒雷登在其回憶錄《在華五十年》

中，曾深情地宣稱：「某種精神上必然的紐帶關係，把我和這個偉大的國家（中國）以及她偉大的人民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作為一個生於杭州、大半生在中國度過、擔當了傳教士、教育家以及外交家等多種角色的司徒雷登，其一生所繫非燕京大學莫屬。自清末民初，隨着西學東漸的風潮和西方教會勢力的擴張，由傳教士創設的教會大學相繼建立，並引進西方近代教育模式，在中國教育界產生了頗為深刻的影響。燕大的成立，便是由美國教會在北平一帶所辦的三所教會學校合併而成。一九一九年春天，司徒雷登受聘成為燕大首任校長，自此為燕大發展而奔波。不少當事人回憶，學校草創之初，可謂是筆路藍縷，僅有五間課室，學生不到百人，教員稀少，經費不足，也沒有設備。司徒雷登四處奔走籌措經費，吸引教員，購置勺園為新址，聘請美國著名設計師亨利·墨菲設計中西合璧的校園建築風格，並進行課程改革，與哈佛大學開展國際學術合作，才使得燕大脫胎換骨，成為中國教會學校之首。

燕大校訓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凸顯司徒雷登對傳教及世俗教育的看法：「我所要求的是使燕大繼續保持

濃厚的基督教氣氛和影響，而同時又使它不至成為宣教運動的一部分。「時值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之際，主張「重估一切價值」、並重「反孔」與「非耶」的陳獨秀等五四知識分子，將宗教斥為騙人的假象。基督教則因其自身所具有的濃郁外來色彩以及和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而引起民族主義者的口誅筆伐。司徒雷登的做法是，一方面不強求學生參加禮拜等宗教儀式，在課程設置、學術討論等方面允許自由地講述真理和科學，另一方面以「團契」為組織形式鼓勵工友、學生和教職員彼此友愛，共度宗教生活。司徒雷登認為，唯有堅持「教育機構的宗旨必須是教育」，而非公開的、以嚴厲校規的方式傳播福音，才能獲得中國各階層的尊敬和友誼，從而「將一種外來的制度根植在中國大地上」。由此，面對二十年代初愈演愈烈的非基督教運動，司徒雷登主導下的燕大開始推行中國化，包括設立國學以及中國文化課程、聘請更多的中國人擔任院系領導等，以適應民族主義高漲時期波詭雲譎的政治形勢。值得一提的是，在燕大歷史系主任洪業的領導下，燕大並未如北大、清華等學校創立獨立的國學院，而是將中國研究融入已有的科系設置，讓學貫

中西的新一代中國史學家以世界主義的眼光重新審視中國傳統文化價值。
正因如此，燕大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一度成為群星璀璨、兼收並蓄的學術聖殿。



燕京大學校訓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凸顯司徒雷登對傳教及世俗教育的看法。（資料圖片）

一九三四年，胡適在《獨立評論》上，在〈從私立學校到燕京大學〉一文中認為，「近年中國的教會學校漸漸地造成了一種開明的、自由的學風，我們當然要歸功於燕大領袖之功。」胡適尤其提到燕大的文科教育得到美國鋁業大王霍爾的資金捐助後，與哈佛大學合作成立燕京學社，因其優厚的資金而吸引眾多中國文史學者競相加盟。與此相比，國立大學無論是教學環境還是薪資待遇，都相形見绌。對此，顧頡剛有詳細的回憶：「當時北大欠薪太多，生活太苦，我回北京後，就去了美國教會辦的燕京大學。燕大待遇很優厚，每個月給我二百四十元工資，房子、電燈、電話等等，都不要錢，生活很好，我於是每日寫作。」三十年代中期，北京各個國立大學由於政局動盪而欠薪嚴重，而燕大則因其得天獨厚的政治和財政優勢得以招徠一大批學界翹楚。根據學者陳遠的統計，燕大的教師隊伍可謂是星光璀璨，「既有國外歸來的博士、碩士如洪業、趙紫宸、馮友蘭、吳文藻、雷潔瓊等，也有國內享有盛名的學者如陳垣、周作人、郭紹虞、容庚、顧頡剛、錢穆、朱自清等，還有燕大自己培養並選送出國深造後學成歸來的學者，如冰心、許地山、齊思和、

嚴景耀、侯仁之等。」其中，國文系在出身翰林的吳雷川主持下，古典與現代文學雙榮並茂，學生可以聽到周作人講現代散文，也可以聽到馬裕藻講經學史。新聞系與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達成合作，吸引了像埃德加·斯諾、成捨我、張友漁這樣的資深記者和報人雲集燕園。社會學系更是名聲顯赫，積極介入中國社會改革，在二三十年代的鄉村建設運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亂世下為學生維護學術自由

誠然，燕大之所以能夠在軍閥混戰、政治派系相互碾壓的亂局之中獨善其身，與西方帝國主義在舊中國享有的「治外法權」不無關係。然而隨着三十年代中後期民族危機的日益加深，司徒雷登相對寬鬆自由的政策使得燕大出人意料地成為激進主義的溫床。以「一二·九運動」為例，燕大最早的共產黨員張放（原名劉進中）曾回憶道，由於燕大和美國教會的關係，「政府不敢妄加干涉，軍警也不敢進校騷擾，因此，共產黨在校園內幾乎能公開活動，從而反日愛國運動也蓬勃發展。」根據《燕大文史資料》的記載，在洋人的「保護傘」庇佑之下，不僅「學校黨支部的活

動很少遭到破壞」，而且黨員數量也急劇增加，「可能是北京各大大學黨員最多的學校」。一九三四年，燕大學生為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宣布罷課，並和其他北京愛國學生一道南下南京請願示威，進而引發校方外籍教員與學生之間的劍拔弩張。當時正在美國籌款的司徒雷登返校之後，立即召開全校大會，宣布自己對學生抗日愛國行為的支持：「如果燕京學生沒有來請願，那說明我辦教育幾十年來完全失敗了。」根據燕大學生馬紹強先生的回憶，校長「態度真誠，聲調懇切，眼中潮潤着，淚水似乎就要掉下來」，令師生動容，就此化解一場危局。盧溝橋事變之後，燕大在淪陷區堅持辦學，司徒雷登斡旋於日本、偽軍、國軍等多方勢力之間，以燕大是美國財產為由堅決反對日軍入校搜捕進步學生，並且暗地裏為有志願前去解放區或大後方的師生提供便利。

司徒雷登面對學生運動所採取的包容與其他教會大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例如，同樣享有盛譽的「東方哈佛」上海聖約翰大學便以其校長卜舫濟的強硬作風而聞名。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爆發之後，聖約翰的愛國師生一時間群情激奮，迅速組織學生會，以罷課聲援死難同胞，引來

校方彈壓。六月二日晚，學生會決定次日清晨吹號召集全體學生下半旗致哀。不料儀式進行到一半，遭到校長的干預。卜舫濟認為此舉無異於政治表態，恐引發英美邦交爭端，遂親自到操場將半旗奪走，隨即引發眾怒。根據錢基博的回憶：卜舫濟「登壇宣布解散，令學生即遠出校，不許逗留，作政治運動」。經此干預，學生情緒難以控制：「三呼民國萬歲，悲憤至於慟哭。」此後，部分師生宣布脫離聖約翰大學，創辦光華大學與母校分庭抗禮。此外，延宕多年的立案爭端使聖約翰大學一度被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在收回教育權運動的影響之下，民國政府多次要求外國人在華辦學必須向政府立案，受中華民國教育部的監督，且特別規定不得強迫學生參加宗教儀式。卜舫濟雖多有妥協之舉，卻始終認為向政府屈服將無法保持學校的宗教特性，因此拒絕立案，以至於聖約翰長時間作為一所「非法」的大學而備受責難，其畢業生也無法受到政府的聘用。

縱觀聖約翰的衰弱，卜校長的耿直立場固然可貴：職責所在，一所教會學校在政治衝突應當嚴守中立，維持其宗教特性，抵制政府「黨化」教育的政治宣傳。與此相比，司徒雷登的處理方式則更具外

交家的手腕。在他的執掌之下，燕大不僅早於一九二九年便完成了立案申請，而且在歷次學生運動中均能夠泰然處之，維持政治與學術、激進與保守、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之間的微妙平衡。

中西合璧辦學理念值得借鑑？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司徒雷登在隨行人員的陪同下，乘坐美國運輸機離開南京，踏上了返鄉之旅。早在半年之前，燕大已在校長盧志韋的領導下迎接解放。隨着朝鮮戰爭的爆發，中美關係惡化，十三所曾經由美國傳教士主持的基督教新教大學成為政治批判的對象，燕園中掀起了「思想改造」的浪潮。一九五二年，燕大在院系調整中被拆分，其校園也歸北大所有。在隨後漫長的歲月裏，有關燕大的歷史記憶一度煙消雲散。對於教會大學的消亡，不少學者認為，是因其濃烈的外來宗教色彩而容易在狂飆突進的民族主義運動中受到衝擊。即便如此，司徒雷登推行的中國化政策說明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洋大學的本色並未影響燕大在國學研究方面斐然的成績，「文化帝國主義」的指控又何嘗不是誅心之論？燕大的關閉並非由於其辦學宗旨上的失誤，而是受到國際冷戰局

勢的牽連。司徒雷登為維持燕大自由風氣所傾注的心血告訴我們，具有政治或宗教動機的政府資助並非一定導致學術研究的意識形態化。相反，處處提防政治滲透，逢人就質問權力、陰謀、動機，反而容易導致學術場域的政治化，凸顯文化的不自信。當今中國政府極力提倡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學」，教會大學中西合璧的辦學理念是否可以成為值得借鑑的

歷史先例？身後是非誰管得。
二〇〇八年，司徒雷登的骨灰遷葬杭州，安放於半山安賢園中，墓碑上只有短短幾個字：「燕京大學首任校長」。老校長最終魂歸故土，而燕大的歷史遺產仍有待後人發掘。

授。）
（作者為新加坡國立大學助理教

司徒雷登生平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美國基督教長老會傳教士、外交官、教育家。

1876年出生於中國杭州天水堂教士住宅，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國的美南長老會傳教士。1887年回美國弗吉尼亞州讀書，1899年進入神學院，加入了「學生海外志願傳教運動」組織。1902年被按立為牧師。

1904年與艾琳結婚，後攜妻子回到杭州，學習漢語，跟隨父親到中國許多地方布道，成了第二代美南長老會傳教士。1908年到南京金陵神學院執教，為希臘文教授。1910年，任南京教會事業委員會主席。辛亥革命時兼任美國新聞界聯合通訊社駐南京特約記者。

1918年下半年，美國南北長老會正式向司徒雷登下達了命令，讓他籌辦「一所新的綜合性大學」，1919年春天出任燕京大學首位校長。1921年，受聘為中國教會教育調查團成員。

1930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授予他榮譽文學博士學位。1933年獲美國總統羅斯福召見，聽取他對中國時局的意見。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他因拒絕與日軍合作，被日軍關在集中營，直到日本投降後才獲釋。

1945年，獲釋後的司徒雷登繼任燕大校長（後為校務長）。1946年7月11日出任美國駐華大使，同年被當時的國民政府授予杭州市榮譽市民。

1949年4月，解放軍攻佔南京，他沒有隨國民政府南下廣州，留在當地。1949年8月2日離開中國返回美國，隨即退休。

1949年8月19日，《人民日報》刊發了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將司徒雷登作為美國的象徵而極盡諷刺，說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回到美國後，他先被美國國務院下了「禁言令」，後來又被麥卡錫主義者騷擾。患了腦血栓，導致半身不遂和失語症。

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因心臟病發在華盛頓去世，終年86歲。

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於杭州半山安賢園。